

大数据时代的民俗文化数字化与民俗地图制作

李向振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武汉,430072)

[摘要]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结构与生活文化发生了剧烈变迁。传统民俗学研究路径难以解释和解决新的社会生活问题,成为当下民俗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鉴于此,借助大数据及现代信息处理技术,通过与地理等自然学科展开对话,探索新研究方法和阐释路径,可以缓解当下民俗学学科的内不足。民俗文化数字化与民俗地图的制作,是民俗学与大数据和地理学等学科展开交叉研究的学术实践,充分挖掘其学术意义及实施路径,可以激发新的民俗学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民俗地图 数字化 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 K890;G122;G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171(2018)02-0049-08
DOI: 10.13365/j.jirm.2018.02.049

Digitization of Folk Culture and Folk Map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Li Xiangzh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dern society and living culture have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folklore study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and solve new social life problems, and it has become the real source of the predicament of current folklore studie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with the help of big data and moder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rough exploring dialogues with the natural sciences such as geography, exploring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interpreting paths, the inherent deficiencies of current folklore disciplines can be alleviated. The digitization of folklore cul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folklore maps are the academic practic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folklore and big data and geography. Fully tapping its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can inspire new academic points of folklore.

[Key words] Era of big data; Folklore map; Digitization; Folklore

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大转型阶段。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转型毫不逊于农业革命之于采集狩猎、工业革命之于农耕文明,从其对

人们日常生活的渗入速度与深度来看,其转型的剧烈程度甚至超过了以前人类社会经历的种种转型。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诸多社会科学,面临着旧有

[基金项目] 本文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学术团队建设项目(WHU2016019)资助、2017年度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41300002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李向振,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俗学理论、当代社会生活变迁、民间信仰等,Email:li.1985@whu.edu.cn。

学术传统难以解释和解决新社会生活问题的困境。其中,以关注人们日常生活文化和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当代民俗学遭遇的学术困境尤为明显^[1]。现代社会正在迅速消解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可以说,民俗学正在遭遇时代危机。如何变革民俗学研究路径,如何重塑民俗学解释力,以应对时代挑战乃至引领时代,是当下民俗学安身立命的根本议题。当前民俗学界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情绪,总的来说,这种焦虑来自于学科传统的不足。在面对现代社会生活与文化变革时,民俗学既不够抽象,即难以形成具有学术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又不够具体,即在描述民俗事象方面难以真正做到“深描”;同时还不够具有人文情怀,这些都需要民俗学者在学术实践中予以反思。正如岩本通弥所言,“固有的民俗学的格局,已经无法真实地把握现实世界”^[2]。因此,“回归当下”^[3]和“转向日常生活”^[4]成为当前学界拯救民俗学学科的重要探索。本文认为,回归当下日常生活的民俗学,不能忽视当前大数据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剧烈变革这一社会事实。从民俗学学术实践来看,民俗学与大数据相结合最常见的路径主要表现为民俗文化数字化和民俗地图的制作与应用。另一方面,民俗文化数字化与民俗地图或许也可以为反思当代民俗学学科困境提供某种可行的新视角。

1 问题的提出: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困境

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民俗学的学科和范式危机本质是学术共识的解体和断裂。这里的学术共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对于研究问题或研究对象有相对清晰的边界意识;二是在面对特定学术问题时有系统的研究方法。

当前以大数据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时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发生剧烈变革。以民俗事象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民俗学学科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传统民俗事象不断衰落甚至消失,民俗学正在失去研究对象,学科阵地正在不断萎缩;第二,现代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新出现的文化事象,既有研究范式和手段遇到瓶颈;第三,现有民俗研究不少是基于个案的碎片化信息,受

田野资料广度与深度所限,难以形成比较研究,进而难以真正理解民俗文化事象变化的内在规律;其四,依托国家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的民俗文化资料文本,因其体量巨大,难以转化成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除以上大的时代背景外,民俗学学科的认同危机还与其自身学术传统密切相关^[5]。实际上,不少本土学者已对此危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度分析^[6-10]。这些分析主要从民俗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甚至研究的方法论等层面具体展开,为我们继续讨论民俗学学科困境与研究转向提供了非常好的学术基础。不过,这些研究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在学理上确定当代民俗学面对社会转型时应该进行学术转向之后,如何将其落实到具体经验研究,即研究方法层面的诸多问题尚有待进一步讨论。

从中国民俗学学术传统来看,当代民俗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类:一是田野研究;二是文本研究;三是田野与文本综合研究。虽然在不少研究表述中,研究者还会提及比较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等具体方法,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传统的比较研究或跨区域研究方法难以落实到学术实践中。而就世界范围内民俗学学术而言,除田野作业、文本研究外,比较研究也是最为常见的方法之一,而比较研究的实现路径则以民俗地图的绘制和使用最富特色。民俗地图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早在19世纪末既已引起欧洲民俗学界注意,20世纪20、30年代以后则被日本民俗学者引入民俗学研究领域^[11],并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研究实践中也得到很好的应用。国内民俗学界对此方法的引入较晚,且时至今日尚未出现较有深度的研究著述。

如前所述,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深刻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其对生活世界的认知和建构方式。正如李松等人所言,“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处理的数据可能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而是全样本的数据;拥有海量即时数据后,人们不再沉迷于数据的绝对精准;更为重要的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无须再紧盯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更加注意

寻找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12]。大数据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往的经验,提醒人们需要重新理解生活中的文化传统,因为经验和文化传统本身正是时间维度上无数具体行动所遗留的文化痕迹。对这些文化痕迹的理解,除传统的田野研究和文本研究外,我们需要借助民俗地图研究法,通过大数据的信息制作和管理技术,将这些经验和民俗文化事象标注到地图上,对其进行更广泛的区域比较研究,从而达到深刻理解文化痕迹的学术目标。

2 民俗研究的“另类”实践:民俗文化数字化

中国民俗文化数字化大致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与信息技术在我国的逐步普及同步^[12]。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学界在民俗文化资源数字化研究的问题意识、顶层设计、标准研制、数字化价值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某种意义上说,数字化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巨大挑战。

例如,1984 年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学者与专家呼吁下,被称为“三套集成”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搜集整理工程正式展开。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到 2009 年,“三套集成”省卷本 90 卷(共计 1.2 亿字),地、县卷本(内部出版)4000 多卷全部完成(总字数超过 40 亿字)。按照有关专家学者的话说,三套集成作为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集大成者,对它们起到了保存、整理的作用,为开创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面对这么大体量的出版物,翻阅尚属不易,更遑论进行学术研究。这为后“三套集成”时代学者提出了新课题:如何对待和利用这些文本资料进行研究?

虽然学界对这批资料的搜集过程及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这些文本本身已经具有了研究价值,对它们既可以进行形式研究,又可以进行内容研究,甚至可以将它们视为某种文化事件来研究。不过,如前所述,由于这几套文本体量实在太大,传统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难以应付这一难题。因此,对这批文本的解读需要借助新的工具,即数据化和民俗地图。我们或许可以借助现代数字

技术,将这些文字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文本数据库,同时按照既有分类原则,将同一主题或相似主题的文本编码标注在地图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旦所有的文本编码都能分门别类地标注到地图上,大量研究问题就会突显出来。尤其是传统的“地理—民俗”研究方法中难以克服的数据分析等问题,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初步分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发展,民俗学学科不得不面对海量多元的民俗文化资源和数字遗产,如何借助新数字技术条件,针对特定专题数据,提出符合专业资料建档要求的研究分类,成为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实际上,在 200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既已起草发布《数字文化遗产保护指导方针》和《数字文化遗产保护纲领》,尤其是“指导方针”部分主要是针对各种文化机构,目的是提供与数字文化遗产资料保护有关的所有重要步骤的成功实践信息和思路^[13],为我们理解民俗文化数字化问题提供了很强的指导。

除民俗学学科困境需要引入数字化技术外,国家政策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也同样存在内在需求。具体而言,国家在制定宏观文化政策时,需要从宏观层面掌握民俗事象的发展规律及文化内涵,同时在当前大力推进的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中,同样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对濒危民俗文化事象进行技术化处理和保存,如对手工艺人进行视频、音频录制,又如曲艺领域的音配像工程等。例如,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负责的《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和《中国节日影像志》两个项目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熟悉本民族或本地域民族民俗文化的学者和技术团队,通过运用现代高清摄像设备采录技术,针对我国濒危的各民族史诗资源、口头传统以及节日文化等特点,抢救性地记录史诗和民间节日在当下的传承与发展情况,为学者将来使用这批资料提供前期工作线索和成果基础。该成果形式充分发挥数字化研究的优势,以影像摄录、文本整理和数据库三种方式立体地呈现当下的史诗演述。

就社会生活而言,新媒体技术和自媒体平台极大地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我们在田野调研中经常会搜集到文化持有者自发拍摄的印象资料,这不仅体现出民众个体进行文化表达所运用的新手段,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从主体内部角度对生活事象的本土应用和自分类意识。此外,民众在互联网上留下的使用记录等数字数据也与日俱增,在互联网平台的使用行为数据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习惯。

尽管民俗文化数字化是包括学术活动、国家治理、生活诉求等多层面的综合要求,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现实问题。从既有实践来看,民俗文化数字化过程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当前数字化以扩大总体文化储量为目标,对专题数据库及科学分类和标准化研究较弱。我们需要注意到在尽可能地趋近某类或某种民俗文化事象总体储量所有数据的同时,适当对民俗文化专题开展数据库建设,只有兼顾总体和样本,“两条腿走路”,才能真正达到保护民俗文化资源整体性的初衷。第二,当前数字化工作多采用的元数据(Metadata)标准和著录规范是国际通行的都柏林核心元数据标准体系,难以顾及民俗文化资源多样性、地域差异性等特点。基于民俗文化资源多样性的特点,民俗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在参考国际通用标准基础上,应当开发和制定充分尊重文化持有者主体文化权利的,符合底层对象特征且兼具专业研究分类特点的元数据标准。当然,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必须与相应的技术公司进行协商和博弈。正如李松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各自为战、小打小闹的数字化,浅尝辄止、目光短浅的数字化,据为己有、设置藩篱的数字化,权责不清、利益失衡的数字化,标准不一、质量不同的数字化,带来的将不是信息化时代的共享性、便利性和文化记录传承的可持续性,而是对民俗文化的一次技术性破坏”^[12]。第三,学者对民俗文化数字化的研究,仍集中在数字化搜集资料阶段,对后期数据库储存的规范和细化、资料的数据加工和数据挖掘、以及对数据的分析及学术研究都需要

进一步深入展开。

总的来说,民俗文化数字化是信息化时代民俗学者难以回避的重要实践。民俗文化数字化既是保存日益式微的民俗文化资料的重要方式,又是拓展当代民俗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路径。同时,在具体实践中,还必须注意到民俗文化数字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毕传龙所言,“民俗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并非好事者的突发奇想,而是根植于民众的生存现状的变迁事实和学者的人文关怀的表达愿望,因此该项工作不能只是着眼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而应该更加重视建立对于民俗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成果表达的规范与机制”^[14]。

3 民俗地图: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民俗地图,简单来说,就是将民俗事象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分类,并将之转化为特定符号标注到既有区域地形图中,以表现各类民俗事象的空间分布状况,民俗事象之间的空间关联状态及其在时间流上的发展变化态势的特定文化地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俗地图是一种关于民俗事象的特定空间叙事。它通过各种指示符号,通过线条、颜色或文字标注等技术手段,综合叙述某类或某个民俗事象的空间或时间故事。因此,研究者可以通过解读民俗地图叙述文本从而达到从更广泛的时空中理解和阐释某种民俗事象的文化内涵及社会生活意义的学术目标。

民俗地图作为研究方法,实际上体现了民俗学与地理学等学科的汇融与交叉研究,对于在更广泛区域上理解民俗事象的文化内涵及分布和变化规律具有极大的便利性。如前所述,就世界民俗学发展史来看,民俗学与地理学相结合,并非很晚的事情。事实是,早在19世纪末,瑞士民俗学家卡尔·科隆即已将地理学应用于民俗学研究,并成功创建“历史—地理学派”,后经其学生阿尔奈和美国民俗学家汤普森共同修订补充,最终形成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AT分类法”(即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5]。与此同时,法国、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民俗学界也在持续制作反映本国民俗事象分布状态的民俗地图,如法国学者克鲁格的《法国传统文化地理》、德国地理学家、民俗

学家帕斯勒的《老萨克森农民屋的地理分布》、瑞士民俗学家威尔德哈贝尔的《瑞士民俗地图集》等,不仅为后世学者研究相应的民俗事象流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同时也推动了民俗地图方法论意义的研究^[16]。日本民俗学界,早在 1920 年代就引入了民俗地图方法并有相关学术论文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此研究方法在日本民俗学界的广泛应用,同时也拓展了该研究方法的理论深度。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民俗地图在日本民俗学界已经成为一种最常见的民俗记述手段之一^[11]。

一般而言,就制作和应用目的而言,民俗地图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信息表现型地图;二是学术研究型地图。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民俗地图并非简单地通过地图制作技术将民俗事象进行符号化处理,标注到地图之中,使各种民俗事象更为直观地展现出来,而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比较的视野。换言之,借助民俗地图,研究者可以实现具体民俗事象的跨区域比较分析,从而提出具有抽象意义和学术阐释力的理论体系。而正因为民俗地图最大的学术意义是其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从而未能像民俗学其他分支一样,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正如何彬所言,“地理学的意识和地图绘制法导入民俗学领域后,并没有像人文地理学的各个分支那样拓展为民俗地理学之类的新领域,而是形成了民俗地图的绘制使用技术以及民俗地图研究法这一具体的民俗资料整理方法和认识方法。这种对民俗资料处理方法的转型,活化了民俗学记述和再现民俗事项的手段,并且于日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诠释民俗现象、阐述民俗理论的方法,是民俗学科在方法论方面的一大进展”^[11]。可惜的是,这样一种新研究方法在早期中国民俗学研究中并未引起特别注意,直到 1990 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才开始有民俗学者尝试对民间文学进行数字化处理,在此过程中,也开始有了零星的民俗地图绘制,就学术而言,此时民俗地图仍未形成学术讨论的话题。直到目前,较为深入的研究及成功应用案例尚在少数,在具体学术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也未突显出来。不过,综合对比民俗

地图方法使用历史、使用广度及研究深度都较为突出的欧洲及日本民俗学界的经验,可以想见,当前中国民俗学界引入民俗地图方法将会面临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民俗事象的分类问题。民俗地图首先是一种民俗文化表现方式,因此,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民俗地图制作者对于民俗事象的初步理解及基础分类。随着现代性日益渗入日常生活,不少传统的民俗事象趋于消失,与此同时,不少新的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民俗事象也被生产和建构出来,另外还有一些被发明的传统等。这些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民俗事象分类体系,或在既有的体裁学意义上的分类体系中有所拓展,或摒弃既有分类体系而另起炉灶等。民俗事象的基础分类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民俗地图制作的准确程度及应用效度。

第二,民俗资料的真实性和广泛性问题。民俗地图是通过标注技术将符号化的民俗事象展示在二维或三维图形上的地图,其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不仅影响到民俗地图独特的叙事效果,更为严重的是其会对研究者产生误导,使其难以对某类民俗事象的空间播布或历史变迁规律进行总结提炼,或做出错误的判断。

第三,民俗地图标注技术更新问题。民俗地图应该随着地图制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研究者也应不断探索新的标注方式,民俗事象分类和总体图之间的层次与联系需随地图编制技术发展而趋向精细化,“避免停留在只有成果的形象显示度而缺少科学性及其研究价值的粗放观赏品状态”^[17]。

第四,民俗地图制作与大数据相结合问题。如何通过大数据处理技术,尽可能将更多民俗事象综合立体地呈现在民俗地图上,力争将民俗地图制作成为民俗事象数据库,并不断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以呈现某类民俗事象的发展变迁轨迹等,也都是未来运用民俗地图作为研究方法的民俗学学者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本文认为,民俗地图是辅助性工具而非研究目的本身,它不是最终结果,但可以是研究工作的理想工具。或者说,民俗地图的学术意义不是其绘制过程,而是对民俗事象的阐释

力。过去,在地图上标注民俗事象并制成民俗地图非常难以操作,不仅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同时也难以把各个历史时期文化事象通过图层叠加进行比较。大数据时代,数据库系统技术、标注技术和现代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更具信息浓度的民俗地图绘制具有可行性。正如何彬所言,“在文字资料之外,借助于图示储蓄的文化信息进行某地区或某个单项文化遗产的研究,会有助于使研究者既避免陷入狭隘的单纯关注某个‘点’的文化现象的弊端,同时又避免视野只停留于泛泛地观看‘面’的浅表性研究”^[11]。如前所述,民俗地图实际上是关于民俗事象的特殊叙事形式。民俗地图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把某种或某类民俗事象通过地图制作技术重新嵌入空间和过程中,从而构造出关于民俗的生态景观^[18]。某种意义上说,民俗地图实际上是一种空间和时间的压缩和叠加,随着相关信息和资料的完善,研究者完全可以不必亲自前往某类民俗事象的生发地而可以通过完善的民俗地图来实现民俗文化的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最终构建出相应的更具普遍适用性的学术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地图的确可以激发更多的学术增长点。在高小康看来,把历史遗迹和编年叙述还原到发生的环境和过程中去,当代人才可能真正感受和理解历史。民俗地图的编制和不断更新延续,就是在为人们保存与生态文化联系在一起、活的、持续的记忆^[18]。

概述之,用绘制地图的手段表现民俗事象,能够在拟制的空间中观察不同民俗事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同一民俗事象在不同区域的具体差异,通过这种比较研究,能够最终实现理解民俗文化内在发展规律的研究初衷。何彬指出,民俗地图可以用来确定某项民俗传承、传播范围,或者用于把握民俗文化分布的特性及传播、变迁的规律。另外,还可以用来做民俗的横向共时性比较研究或纵向历史性比较研究^[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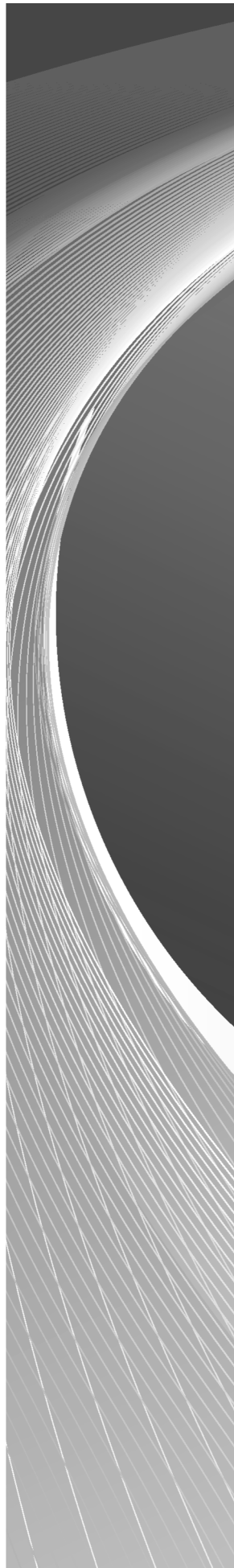
4 大数据时代民俗地图绘制新的可能性及基本原则

作为一种新兴的数据处理技术,大数据能够更为有效地集成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在大

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分析更多的数据,有时候甚至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20]。因此,在数字化的世界里,过去不可能的解决方案将会变成可能。民俗地图的制作和应用便是其中一例。如前所述,民俗地图并非新鲜事物,然而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作为民俗学研究的辅助性工具和具体研究方法,并未能发挥极大优势。原因之一就在于民俗地图所要标注的民俗事象繁多,且数据体量庞大,传统二维地图绘制技术难以实现较为系统全面的标注民俗事象的目标。同时,同样受标注技术限制,传统民俗地图事实上显示的某种民俗事象,往往是抽离了其生存语境的碎片化民俗元素排列,难以真正实现民俗研究的学术要求。

民俗地图所遭遇的以上困境,在大数据时代有望得到解决。当前,以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并突显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活力和令人信服的阐释逻辑。GIS所具有的整合分析数据优势及其突出空间区位性,为民俗地图绘制提供了技术支持。大数据时代,民俗地图的制作可以借助数据库技术、GIS技术、GPS定位技术和流媒体技术,同时与前面说过的民俗文化数字资源密切融合^[21]。充分运用网络地理信息系统(WebGIS)和内容管理系统(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在继承传统地图原有文字检索功能同时,强化空间视觉效果。GIS能够拓展民俗文化的展示空间,通过将抽离了直观地方性的文化事象还原到可控电子地图上的方式,使民俗事象回归到社会生活整体中,从而为深度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民俗地图集的制作方法》一文中,罗伯特·威尔德哈贝尔将民俗地图的制作分为三个阶段:材料的搜集、出版的前期步骤和出版^[16]。具体而言,民俗地图的绘制,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材料的搜集。搜集材料的人员,一般分为通讯式调研员和专业调研员。材料搜集的基础是对民俗事象进行科学的分类研究。人们在搜集某种题材或某种类型的民俗事象时,也许并不能意识到这种民俗事象



在更广泛区域内有什么意义,但当所有的民俗事象都被搜集上来,并按照某种标准标注在同一地图中时,各种问题就会立即浮出水面。为什么同一民俗事象在不同区域内呈现不同形态?为什么同一区域内有不同民俗事象的分布?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造成这些不同的社会原因是什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需要借助民俗地图和社会学的想象力进行具体研究,而这能够提升传统民俗学在阐释民俗文化流变与民众生活变迁方面的能力。

除资料搜集外,民俗地图具体绘制过程中,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到底使用“面式”系统,还是“点式”系统,以制作出更好的民俗地图。所谓“面式”系统,就是地图制作者以某区域为基础,将该区域内所有民俗类型进行分类标注,突显的是特定区域内不同民俗类型之间的相互关联;而“点式”系统,则以某类民俗事象或民俗事件为核心,在更广泛的区域地图中进行标注,更注重同一民俗类型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特征及规律。不过,在实践中,无论是选择点式,还是选择面式,地图的设定都必须结合所搜集材料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综合考虑。再者,还有注释问题,除相应符号、数据使用、从文本中抽取的段落或其他技术性问题的解释外,民俗地图制作者还应尽量避免去诠释事实,诠释的任务应该由使用地图的学者来完成。

在正式出版之前,为提升民俗地图所蕴含的研究效力,制作者还需要有尽可能完整的参考文献,如有必要还要附上图画、图表和照片等。序言部分还必须包括一份目录清单,解说数据框架中列出的所有材料所解释的问题是什么,选择材料的标准及类型是什么,以及制作民俗地图的总体问题意识是什么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交代清楚^[16]。这些都是以后民俗学者使用该地图分析具体问题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事实的立足点。

当然,利用现代数据处理技术,除标注具体民俗事象外,制作者还应该尽可能搜集与之相关的基本地图要素,如行政边界、街道、地质、土壤、街道、人口分布、城镇、乡村、工业、历史样态等等。这些都对民俗地图使用者理解

民俗地图上标注的民俗事象的消长变化,及所蕴含的生活意义有所助益。

5 小结

大数据时代民俗文化之所以需要数字化以及能够开展数字化研究,并非学者盲目跟风行为,而是信息技术发展及海量文化资源所激发出来的知识大爆炸对学术界的内在要求,是综合各种驱动力下的大势所趋。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需要借助数字化手段将民众的知识返回给民众,同时又需要借助大数据分析获得更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提交给文化政策的决策者。具体到民俗研究来说,在文字资料之外,借助民俗地图对某种民俗事象进行标注和研究成为民俗研究的重要方法。同时,可以预见,在大数据时代,随着民俗地图绘制、标注与分析技术的极速发展,将会有更多学术增长点被激发出来。

一方面,大数据可以突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与壁垒,使得民俗学与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结合成为可能。现代地理学中的各种信息技术为民俗地图的绘制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借助民俗地图进行研究的民俗学也可以为现代人文地理学拓展研究视角,正如董晓萍等人所言,“民俗学与地理学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从学科建设上说,为文理科双方学者开拓了视野,获得了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产生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能不断激发出创新研究的思想火花;从社会应用的角度说,它为高校学者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平台,为扩大单一学科的研究空间和提升解释能力提供了机遇,也为参与解决现代自然环境和全球文化变迁中的新问题提供了可能性”^[22]。

另一方面,大数据为现代民俗地图制作提供更多信息源。通过各种数据的横向联动,为建立更为全面详实的民俗地图数据库提供了某种便利。“在知识的演化过程中,数据是产生信息、知识、智慧的基础”^[23]。从这个意义上说,面临学科困境的当代民俗学或许可以利用民俗地图研究方法,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获得新的学术知识。再者,民俗地图与大数据相结合,为民俗文化数字化实践提供了新路径,同时也为民俗文化提供更为直观的呈现

方式。借助信息技术,人们通过高信息浓度的民俗地图可以很好地了解某种民俗事象生存的社会语境,进而实现更好地理解民俗事象及其社会意义的学术目标。

总之,在面对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转型

时,当代民俗学需要打破既有学科壁垒,以开放的心态积极谋求与大数据的深度结合,与更多的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展开学科对话,进而为民俗学学科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才有可能在学科困境中找到救赎之途。

参考文献

- [1] 李向振. “通过民俗”:从生活文化到行动意义的摆渡[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88-94.
- [2] [日]岩本通弥. 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J]. 王晓葵译. 文化遗产, 2010(4): 109-115, 158.
- [3] 王杰文. “朝向当下”意味着什么? ——简评“神话主义”的学术史价值[J]. 民间文化论坛, 2017(5):11-16.
- [4] 李向振.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当代民俗学贴近现实社会的一种路径[J]. 民俗研究, 2017(2): 16-23, 157.
- [5] 岳永逸. 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学科传统与日常转向——以北京生育礼俗变迁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0(1):76-87.
- [6] 田兆元. 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当代转型[J]. 文化遗产, 2014(6):1-8, 157.
- [7] 周星. 民俗主义, 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J]. 民俗研究, 2016(3):5-14, 158.
- [8] 张士闪. 学科反思、学术批评与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J]. 民俗研究, 2010(4):264-270.
- [9] [德]沃尔夫冈·卡舒巴. 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 ——欧洲经验与视角[J]. 彭牧译. 民俗研究, 2011(2): 41-51.
- [10] 高丙中. 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J]. 民俗研究, 2017(1):19-34, 157.
- [11] 何彬. 民俗地图的学科依据——“民俗地图”与“文化传承图”体系系列论文之一[J]. 民族艺术, 2010(1):44-51.
- [12] 李松, 王学文. 跨越数字鸿沟——信息化时代中国民俗文化数字化的现状, 问题与对策[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5(6):155-160.
- [13] 顾森. 数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指导方针[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3(1):40-44.
- [14] 毕传龙. 大数据时代民俗文化资源的数字化[J]. 民族艺术研究, 2016, 29(3):87-93.
- [15] 孟慧英. 西方民俗学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124.
- [16] [瑞士]罗伯特·威尔德哈尔尔. 民俗地图集的制作方法[J]. 姚丽梅等译. 文化遗产, 2012(3):47-53, 157.
- [17] 张杰. 民俗地图直观显现民俗变化状况和趋势——访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小康[EB/OL].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8-03-18]. http://news.cssn.cn/zx/bwyc/201705/t20170528_3533521.shtml.
- [18] 张杰. 民俗地图催生研究新增长点[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1-20(002).
- [19] 何彬. 民俗地图的基本构造与制作——“民俗地图”与“文化传承图”体系系列论文之二[J]. 民族艺术, 2010(2): 25-34.
- [20] [英]迈尔-舍恩伯格, [英]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M]. 盛杨燕, 周涛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7.
- [21] 刘先福, 张刚. 民间文化的数字化类型与空间演示——基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空间信息系统》的思考[J]. 民俗研究, 2014(5):26-33.
- [22] 董晓萍, 王静爱. 民俗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的理念与实践[J]. 民俗研究, 2013(3):34-39.
- [23] 陈潭等.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3.

(收稿日期:2018-03-20)